

读书

D U S H U

2014



生活 · 读者 · 新知 三联书店

读书

D U S H U

7

2014

July

唐文明 夭折的启蒙还是启蒙的破产？

钱理群 想起朱光潜先生

董炳月 安重根的遗产

余英时 从传统到现代：中国研究在美国的转向

江晓原 从《雪国列车》看科幻中的反乌托邦传统

王德威 萤火虫与虱子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读书》2014年合订本 / 《读书》编辑部编. — 北京: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5.6

ISBN 978-7-108-05353-4

I. ①读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书评—中国—现代—选
集 IV. ①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10653号

- 编 辑 《读书》编辑部
封扉设计 陆智昌 薛 宇
责任印制 郝德华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邮政编码 100010
网 址 www.sdxjpc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装 订 北京博丰伟业装订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年6月北京第1版
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800千字
定 价 128.00元 (上、下全两册)

(印装查询: 010-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)

世上本无诸葛亮

演义尺寸
黄永厚画
世上本无诸葛亮
四益



小时候，听三国故事，似懂非懂，只有两句话印象深刻——曹孟德过后方知；诸葛亮未卜先知。

“过后方知”，当然是因为他接二连三中了周郎诡计。蒋干盗假信，他杀了蔡瑁、张允；庞统献连环计，他把船只都锁连在一起；阚泽下诈降书，他信以为真，待到火烧战船，兵败赤壁，方知大势去矣。而诸葛亮，事事预知，好不神奇。

及至长大，才知道那不过是写书人所弄狡狴。孟德若真是如此不堪，三分鼎立也轮不到魏国独大。但心里总还希望有几个未卜先知的能人来治理国家。结果总是失望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要精简机构了，觉得事料机先，效率有望。没想到精简一次，便膨胀一次，冗官冗员，变

本加厉。

也是八十年代，我们曾以“自行车王国”自豪，声称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。曾几何时，大城市自行车几已无路可走，而无节制的发展，使土壤污染、水源污染、大气污染，接踵而至，何曾避开那条倒霉的“老路”？

还是八十年代，有人据“他山之石”，预警在快速发展期，建筑物的质量最可能出问题。也算是料事机先。但二三十年之后，塌桥倒房接连不断，一样也没有避开。

一个时期，一个口号，似乎都是高瞻远瞩，但前车之覆，何以不曾避开一个？是社会的发展，也如魔咒，无人能够逃脱，还是世上本无诸葛亮，再好的说辞也都化为官样文章！

-
- 施爱东 顾颉刚、钟敬文与“猥亵歌谣” 3
陈泳超 陌生的田野 12
- 贺照田 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 20
徐 贲 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与希望 29
- 唐文明 夭折的启蒙还是启蒙的破产？ 38
瞿 骏 教科书的启蒙与生意 49

短长书

- 想起朱光潜先生 钱理群 57
林毓生的真性情 萧功秦 59
天下第一蒙顶茶 郑培凯 64
从“美国大杏仁”到“巴旦木” 赵武平 68

-
- 董炳月 安重根的遗产 72
韩东育 思归的游魂 83
- 余英时 从传统到现代：中国研究在美国的转向 90

王 杰 湘江流绝唱 99

江晓原 从《雪国列车》看科幻中的反乌托邦传统 105

杨 早 为什么是饭勺? 116

品书录 122

萤火虫与虱子(王德威)·棋盘中的历史(章琦)·还原历史的色香(长安)·门打开了就别再关上(陈怀宇)

林丰民 欧洲妖魔化的伊斯兰形象 著译者言 138

陆 胤 以人物破除界限 145

陈昌强 《二汪诗卷》的历史细节 155

赵一凡 汉中艳遇 阆中围城 西部国情考 160

读书献疑 172

把书读对(熊秉元)

刘以林 漫画 48

陈四益 黄永厚 画说 封二

顾颉刚、钟敬文与“猥亵歌谣”

公开号召文人搜集“猥亵歌谣”，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是破天荒的。周作人为了推广“猥亵歌谣”这个新概念，以及提倡“猥亵歌谣”的搜集整理，前后写过不下十篇文章，光是以此为题的“猥亵系列”就有《猥亵的歌谣》、《征求猥亵的歌谣启》、《关于“猥亵歌谣”》、《从猥亵的歌谣谈起》等，甚至还打算编辑《猥亵歌谣集》和《猥亵语汇》，“建设起这种猥亵的学术的研究”。

提倡搜集“猥亵歌谣”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。发轫于一九一八年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，起于刘半农拟定的《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》，其征稿条件中原有这么一条：“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，不涉淫亵，而自然成趣者。”歌谣研究会后来交由周作人主持，他觉得这一条提得太保守，于是在一九二二年修订后的章程中改成了“歌谣性质并无限制，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，当一并录寄，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”，不过，这点小改动似乎并未引起大家注意，几乎无人响应。

周作人对于公众不能注意到这项工作的启蒙意义多少有些失望。一九二三年底，他又单写了一篇《猥亵的歌谣》，将“猥亵歌谣”笼统地定义为“非习惯性地谈及性的事实者”，分成四个类别，私情、性交、肢体、排泄。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说，他将涉及性心理、性

行为、性器官，乃至性暗示在内的全部民间歌谣都装进了这个大箩筐。按照周作人的界定，半数以上的民间情歌都可以贴上“猥亵歌谣”的标签，在他自己所举的例句中，连欧阳修的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都不能摆脱“被猥亵”的命运。

周作人这篇文章的目的自然是奔着“思想启蒙”的光明大道而去的：“猥亵的歌谣，赞美私情种种的民歌，即是有两性的烦闷而不实行的人所采用的别求满足的方法。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可以不希求富贵，过着庄端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，于是唯一的方法是意淫，那些歌谣即是他们的梦。”对于“猥亵歌谣”的文学价值，周作人比较犹豫，一方面他认为“我们知道这些歌谣里所含的艺术分子大抵很少”，“寻常刊行物里不收这项文字，原有正当的理由”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些歌谣“在学术上自有适当的地位”，所以“在非卖品或有限制的出版品上，当然又是例外”。至于在学术上到底有什么地位，他也没明说。结合他在其他文章中的表述，大概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意思：“猥亵歌谣”反映了一代青年的性爱幻想，可以用来研究中国民众的性心理。

这篇文章反响很大，但从总体效果看，似乎并没有起到启蒙的作用。一九二五年十月，周作人再次出击，联合钱玄同、常惠发出一篇《征求猥亵的歌谣启》：“大家知道民间有许多猥亵的歌，谜语，成语等，但是编辑歌谣的人向来不大看重，采集的更是不愿记录，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东西，不能写在书本子上。我们觉得这是很可惜的，现在便由我们来做这个工作。”这里再次强调了“猥亵事物的范围内普通包含着四个项目，即私情，性交，肢体，排泄”，明确了搜集的目的和意义：“我们想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，看他们对于两性关系有怎样的意见与趣味。”

用顾颉刚的话来说，周作人很有些想法，但“不是一个办事的人”。总之，周作人只负责扔炸弹，扔完就完事了，并不负责收拾残

局。别人寄来的歌谣他没有整理，允诺的出书和赠书计划也没有兑现，来来去去，他只是推广了“猥亵歌谣”这么一个新概念。一年后，周作人发表《关于“猥亵歌谣”》，对于自己未能兑现承诺做了一点简单的说明，把主要责任推到了顾颉刚的头上：“第一是私人的事情，因为疑古君本年有颇长久的‘天鹅绒的悲哀’，没有心思执笔，随后常君出京去了，我，倒还没有别的障碍。”

二

顾颉刚是个闲不住爱张罗事的人，他那本被刘半农认为值得“大书特书”的《吴歌甲集》虽然出版于一九二六年，但其中歌谣多是一九一九年前后休学在家时搜集的。

顾颉刚将这二百首歌谣分成五类：一、儿童的歌；二、乡村妇女的歌；三、闺阁妇女的歌；四、男子（农、工、流氓）的歌；五、杂歌。他把后四类又再统归为“成人的歌”。其中乡村妇女的歌大多数都是私情歌：“这是以她们的中心思想（爱情）发挥而成的歌；因为她们没有受过礼教的熏陶，所以敢做赤裸裸的叙述。”胡适在序言中对乡村妇女歌和男子歌大加赞赏，甚至认为这才是“真正民歌”。可是，如果按照周作人的分类法，被胡适认为是真正民歌的部分，恰恰都可归入“猥亵歌谣”，比如这首《结识私情结识隔条浜》：

结识私情结识隔条浜，

绕浜走过二三更。

“走到唔笃场上狗要叫；

走到唔笃房里三岁孩童觉转来。”

“僚来末哉（你来好了）！

我麻骨门门笏帚撑，

轻轻到我房里来！

三岁孩童娘做主，

两只奶奶塞子嘴，
轻轻到我里床来！”

顾颉刚认为这首歌谣与《诗经·召南·野有死麕》如出一辙，说的都是一个意思，女子呼唤情人“轻轻到我里床来”，不要惊动了门口的狗和床上的孩子。当然，歌谣吟唱的内容并不是歌者的实际生活，而是歌者的愿望或者想象。歌者咏唱幻想，以幻象代替现实，在幻象中自慰自足、自怨自艾，原本是文学创作的特质。这些男男女女的私情歌谣，在顾颉刚的分类体系中是普通的成人歌，但在周作人的分类体系中却是“猥亵歌谣”。歌谣的分类本身就反映了分类者的眼光和态度。

《吴歌甲集》出版之后，顾颉刚除了寄送歌书，还不断写信鼓励别人参与到歌谣运动中来。钟敬文一九二七年出版的《盍歌》“序言”中就说：“我的好友顾颉刚君，他知我在搜集这种歌谣，几次来信，都劝我把它编辑成专书。这种为友谊和为学术的浓情的敦促与勉励，是我们不能不急于把工作完成，以求报谢的。”

“盍歌”是广东水上居民的一种歌谣，盍民文化相对比较落后，这使得盍歌歌词更粗俗直白一些，但也更有水上居民的“咸湿味”：

白菜开花白抛抛， 啰，
妹当胸前二粒瘤， 啰，
兄当伸手掷一下， 啰，
亲像肉饼兼肉包， 啰。

钟敬文当时还只是广东陆丰一间乡村小学的教师，密切关注着北京的文化大拿们叱咤风云的文化高论。在没有看到顾颉刚的《吴歌甲集》之前，对于周作人的系列“猥亵歌谣”论调，钟敬文的态度是谨慎的。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出版了钟敬文的《客音情歌集》，他在“引言”中说到“所谓山歌的大略情状”：“那里居民，作业于山，信口唱咏，谓之山歌。或独唱，或对唱，或群唱，没有一定的情形，

山歌的内容，十分复杂，大概关于恋爱事情的尤多，而且有的却分外秽褻。”可惜的是，那些被钟敬文视作“分外秽褻”的歌谣，全都被剔除了，《客音情歌集》像水洗般“干净”。

《吴歌甲集》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出版，在民俗学史上的示范作用很大，以致后来多有模仿而以名书者，如稍后的《吴歌乙集》、《闽歌甲集》、《福州歌谣甲集》、《广州儿歌甲集》等。《盍歌》的编辑也受到了《吴歌甲集》的影响，大胆收录了一批可被周作人视作“猥褻歌谣”的咸水歌，钟敬文在该书“附录”中说：“咸水歌是盍家族的一种心声，于我们喜欢文学的人，是很值得去研究和鉴赏的。它的优点，在于表情的真切和音律的谐美，至鄙秽之处，虽不能免，但就它大抵上看起来，也那不过白璧微瑕罢了。”

一九二七年，受到傅斯年的邀请，顾颉刚从厦门大学转往中山大学，出任史学系主任，协助傅斯年创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。顾颉刚决心利用中山大学在经费和人事方面的便利条件，集合一班有志于民俗学事业的同道，成立民俗学会、发行《民俗周刊》、编印民俗丛书，钟敬文就是顾颉刚从岭南大学聘来的一员干将。

一九二八年出版的《吴歌乙集》，是民俗丛书之一种。编者王翼之是顾颉刚的苏州老乡，受了顾的影响和鼓励，用了一年时间搜集了一百余首民歌，编成《吴歌乙集》，体例完全依照《吴歌甲集》，把儿歌分为上卷，其余乡村妇女的歌、闺阁妇女的歌、男子（农工流氓）的歌、杂歌四类分为下卷。胡适曾在《吴歌甲集》序中说顾搜集的乡村妇女歌和农工流氓歌少了一点，于是王翼之把搜集重点放在了这两类，用于补阙。

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《吴歌乙集》中性爱想象最露骨的情歌也只有《姐要低来郎要高》、《姐妮生来白奶白胸膛》、《姐要高来郎要低》、《日头直仔劈居中》、《姐妮生来白爱爱》等少数几首。

全书最露骨的句子也无非就是“勿要说黄狼身小脚短会偷鸡，

爹娘勿要怪媛唔身小会偷郎”、“奶奶头好像光福山落地紫杨梅”之类。按顾颉刚的分类，这是“成人歌谣”，按周作人的分类，这叫“猥亵歌谣”。正是这几首歌谣，直接导致钟敬文丢掉了他的第一份大学教职，因为他是《吴歌乙集》的责任编辑。

三

一九二八年之前，中山大学的出版业务极少，出版部一般只是承印一些讲义通知之类，从学校领导到具体的报纸编辑，大都没有用稿审查的意识。这一宽松的环境为民俗丛书的印行带来了不少方便。顾颉刚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与钟敬文等人同到傅斯年住处开会，商量创办四种刊物，议定之后，无须繁琐的文字方案，似乎也未经学校当局审批，马上就能付诸实践，大张旗鼓干了起来。

后来随着印务量加大，出版部主任伍叔傥向校长致函要求“设立出版物审查委员会”，该委员会成立之后，民俗丛书的印制和发行就不再由民俗学会自己说了算，必须交由教授会审批。有了所谓审批，审和被审之间就一定会有矛盾，顾颉刚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孟真见告，谓昨日校中出版审查委员会开会，将研究所已审查之书重行审查，叔傥不肯以《民俗丛书》付议决，思敬至有‘《民俗丛书》将成顾颉刚丛书’之语。”这里提到的“民俗丛书”就包括了《吴歌乙集》。

顾颉刚非常生气，他采取了两条途径来解决问题。第一，行政途径。他马上给远在浙江的副校长朱家骅写了两封两千余言的长信，把伍叔傥阻止出版的事论了一遍。朱家骅收到信，五月三十一日分别给顾、伍两人回电，表示要继续出版，伍叔傥因此愤而提出辞职（后被挽留）。第二，制度管理。在朱家骅批复的基础上，顾颉刚促成了《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细则》的订立，该细则规定：“本会为本所一切出版物审查机关，有审定应否出版，及出版先后次序之全权。”“全权”

两字很关键，有了这把尚方宝剑，民俗学会出版物再无审查束缚之忧。

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，顾颉刚自始至终没有和伍叔傥做过任何沟通，也没有征求过其他审查委员的意见，更没有考虑人际关系的问题。这一疏忽为随后的许多工作埋下了隐患，甚至直接导致了钟敬文的被辞退，以及随后他自己离开中山大学。

顾颉刚自诩为纯粹的学者，非常不乐意将时间牵扯和浪费在人际关系上，说话和处事都是直来直去，他自己也常在日记中检讨“予自知无处世之才，说话太老实”，“予作事太锐，招人之忌，自在意内”。可是，他越想过一种纯粹的学术人生活，他就越容易得罪人，越得在人事问题上伤神费力。

中山大学出版审查制度的建立其实是一种必然趋势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个迅猛发展的时期，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思潮和奇谈怪论都在这一时期获得大流行，这不能不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，其结果自然会引向出版物的管制。

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，《国立中山大学日报》刊载了一则题为《大学院训令禁止生徒购阅淫猥书报》的通告：“各校对于诱惑青年之淫书淫报，猥亵杂志，禁止生徒购阅，以收杜渐防微之效，请烦查核办理等由，查淫猥书报，流毒社会，在青年学子，尤为易受诱惑，诚如内政部所言，亟应通飭各校，一律禁止各学生购阅，以端趋向，而肃学风，除分行外，合行令仰该校长，即便遵照办理。”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不可能不涉及“性”话题，要给这项工作扣上一顶“猥亵”的帽子实在是太容易了。但是，这则信息并未引起民俗学会同人的注意，他们相信自己的工作是为学术为真理的，因而无暇顾及这些学术之外的信息。

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，学校当局突然通知辞退钟敬文，这一突来横逆，无论对钟敬文个人还是对民俗学运动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，顾颉刚在该日日记中写道：“敬文为学校所辞，谓是因《吴歌乙集》

有秽亵歌谣之故，为戴季陶大不满意。然此等事由我主持，何不辞我耶？”顾颉刚日记此前一直称戴季陶为“戴校长”、“季陶”，此处直呼其名，足见其心情之愤怒。

钟敬文的愤慨则充满着悲怆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：“这样的时代里，正义的拥有者，永远要吃亏的。你要主张真的学术，你要提倡真的人道，那你最好是预先具备了上十字架去的勇气，否则，这可不是好玩的，你必至于要痛悔着当初何苦来！受到此等对待，老实说，我觉得自己还大大的不配，但我竟因此获了罪，我倒能觉得泰然。并非我是怎样神勇——我是个脆弱不过的人，这是用不到讳言的——只在眼里心中，很清楚地看出这是必然的道理而已。”直到九十九岁高龄的钟敬文说起这件往事，依然耿耿于怀，斥责戴季陶为“假道学”。

顾、钟均未提及另一个事实，戴季陶虽为中山大学校长，然而由于他身兼国民党政府数个要职，还被推为国民党“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”，长期不在广州，不理校政，实际主持中山大学校政的是副校长朱家骅。辞退钟敬文这段时间，戴季陶远在北平，由他千里飞刀辞退钟敬文，这是非常蹊跷的。

最可能的情况是，“道学”教授们发现朱家骅明显站在顾颉刚一边，他们从《吴歌乙集》中找出了一批“猥亵歌谣”，然后越过朱家骅，直接寄给了戴季陶。戴季陶作为国民党的理论宣传家，掌管“精神文明”的建设，况且还有《大学院训令禁止生徒购阅淫猥书报》的通告在先，他不得不对民俗学会出版“猥亵歌谣”做出反应。可是，当时顾颉刚在中国学界的名气如日中天，中山大学正处于“千金买骏骨”的阶段，戴季陶不能处分顾颉刚，而钟敬文当时只是文史科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一名教务助理员，正好可以用来祭刀。

钟敬文被辞，民俗学会受到沉重打击，《民俗周刊》面临夭折的危机，这段时间顾颉刚几乎每天都去找朱家骅副校长诉苦，陈述民

俗学的重要性，仰朱家骅之力，才勉维持了民俗学会的继续运转。

对于这起著名的“猥亵歌谣”学案，部分学术史家只是简单地定性为“反动教授”对“进步教授”的压制和迫害。其实只要略做换位思考，我们就很难判定谁是反动、谁是进步。即使是“罪魁祸首”戴季陶，也自有他的一番大道理：“现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，国民卧薪尝胆之时；关于出版之事，极为重大；即谓今后国家之兴亡，系于出版品之良否，亦无不可；尤其是文法两科之出版品，要时时不忘‘明耻教战’之意；庶几可从死中求活。”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最早提议设立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的“反动教授”伍叔傥，也未尝不是在为学校的制度化建设做贡献，何况他早期也曾是民俗学会的积极支持者。

反过来，从“进步教授”的一面来看，周作人自鸣得意的“猥亵歌谣”这一文化标签，无疑是一种自我污名化的、授人以柄的做法，犹如电影导演主动给自己的作品贴上“三级片”的分级标签。而顾颉刚在学术工作中一意孤行，勇往直前不拐弯的处世作风，也为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埋下了地雷。当时还只是小人物的钟敬文，实际上成了这些“进步教授”疾行冒进的替罪羊。

《日本之美——东山魁夷绘画艺术研究》

郭勇健 著 定价：48.00元

通过一系列概念去理解东山魁夷的绘画，捕捉住、揭示出东山魁夷绘画艺术的“存在密码”，构建东山的“日本之美”的美学框架，完成了“一个中国人眼里的东山魁夷绘画所呈现的日本之美”的美学探索。指出东山绘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日本之美，但他表达了对传统日本的永恒乡愁。

学林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

陌生的田野

钞录会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，所以一班香客都很注意，他们聚着看我。有的疑惑道，“钞来作什么的？”有的诧叹道，“他写得真快！”有的重碰见了，对我笑道，“又来了！”我本来很怕羞，更经不起他们的注意，要不是受了压抑了一年的好奇心的逼迫，一定是羞怯得写不下了。现在居然把它们钞完，虽是有许多节录得简单，总算得到了一个大概情形，我真是非常的快乐。

——《妙峰山的香会》

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日（农历四月初八至初十），顾颉刚与容庚、容肇祖、孙伏园、庄严一行五人，承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嘱托，来到京西妙峰山调查进香风俗。由于五人中的孙伏园掌握着《京报副刊》这一颇有影响的阵地，这次调查回来各人所写篇什，以“妙峰山进香专号”为名从该年五月到八月陆续刊发了五期，引起社会上正反两面较为广泛的反响。现在学术史家一致认为，此行揭开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田野调查的第一页。一九二八年九月，顾颉刚将与这次调查相关的二十九篇文章汇集成册，题名《妙峰山》，作为中山大学“民俗学会丛书”之十八出版。何思敬在其中《读妙峰山进香专号》一文里就赞叹说：“妙峰山专号

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。不特关于民间宗教，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，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。”其中，顾颉刚的贡献显然最大，他不独是这次田野调查的发起者，也是最勤恳的调查人员。他不知疲倦地抄录那些会启，不单引得香客们围观风评，连同行的庄严等人也自叹弗如：“此颉刚之所以为颉刚也！”《妙峰山》里最有价值的文章，是顾颉刚的长文《妙峰山的香会》，而文中最有价值的部分，便是建基于他所抄录的九十九份会启之上的分析。顾颉刚本人对此也有坚确的信心，面对社会或学界的一些负面评论，比如说宣扬迷信、小题大做之类，他毫不谦虚地说：“我常想，能够注意这个问题的，怕全国只有我们几个人吧？我们调查的固然不详细，但比我们详细的还有谁呢？”

但不久之后，顾颉刚就发现这话说得未免有些托大，还真有一个人比他们调查得更早、也更详细。此人叫奉宽，号“小莲池居士”，满洲人，在光绪丙寅年（一八九六）就奉母朝山，从民国甲寅年（一九一四）开始又连年挈妇将子上山进香，积三十余年经验见闻，又特别留心于史事，将妙峰山各香道沿途碑碣古迹包括会启之类，一一摩挲抄录，并引证近百部文献，写成了一本《妙峰山琐记》，原是拜托容庚觅地出版，尚未着落。顾颉刚偶然在容庚处见得，如获至宝，当即求归中山大学，作为“民俗学会丛书”之三十六出版，并亲撰序言，毫无保留地推奖说：“这才是正式的调查！这才是调查的型式！”末了，还不吝煽动：“本书的读者们，你们若不继续着奉宽先生的脚步而前进，你们真是辱没了这时代的使命了！”

二

顾颉刚一向果毅自负，能让他如此倾心推奉的，必有过人之处。将《妙峰山琐记》与顾颉刚的论文《妙峰山的香会》稍做比对，即可发现，在学术内容尤其是材料的绵密完备方面，后者几乎可以被